

论《创世记》

〔古罗马〕斐洛著

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须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04 年已先后分十辑印行名著 400 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一辑。到 2010 年年底出版至 46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 年 10 月

中译本导言

王晓朝

有学者说：“西方文化之根是成长于东方之土，它植根于希腊与希伯来文化。”^①此话以大树比喻西方文化之发展，其意不差。然而，若以河流比喻西方文化之发展则更具历史性，更为贴切。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表述：西方文化的源头在“两希”，即古希腊与古希伯来；古希腊文化以其哲学为主要精神代表，古希伯来文化则以犹太教为主要精神代表；两种古代文化各自经过曲折变化的历程，在古罗马帝国相遇、碰撞和融合；其结果，新的精神代表——基督教切入了这一历史场景，上升为西方文化的主流，西方文化发展的下一阶段被定向为基督教文化。

两希文化融合的历史层面已由历史学家们作了比较清晰的阐述，但解释其精神层面的融合仍有待学者们的辛勤劳作。研究斐洛可以作为这项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和突破口，因为斐洛的思想体系是两希文化之融合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初产生的一朵奇葩。这

^① Albert E. Greene, Jr.,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culture*《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赵中辉译，台北，1994，页16。

个体系总结性地综合了整个希腊文化时代东西方思想的精华,将一神论的犹太教义与希腊理性哲学或理性神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后来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的融合预演了整合的一幕。

时代背景

斐洛是一位生活在罗马帝国建立初期的犹太思想家。对于理解斐洛的思想来说,了解希腊文化晚期的文化变迁比罗马帝国初期的文化状态更为重要。

公元前四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是喀罗尼亚战役(公元前 338 年)和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 334 年)。它们标志着希腊古典文化的发展走到了尽头,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新时期开始了。历史地看,早在希腊向东方进行大移民(公元前 8—前 6 世纪)前,希腊和东方就有密切的交往。但是,亚历山大“打破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藩篱。”^①他雄心勃勃地想要把希腊文化与被征服的东方各国文化熔于一炉,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文化融合的措施。然而,民族文化的融合需要时间,也需要统一的政治架构。随着亚历山大的突然辞世,帝国分裂成若干个希腊化王国。整个希腊化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只达到了局部的融合,没有出现完全的整合。罗马帝国的统一则使古代地中海世界再次有了一种统一的政治架构。

^① J. B. Bury,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希腊史:到亚历山大大帝之死》,New York, 1937, 页 771。

由于希腊古典文化的辉煌成就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发展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扩展和延续。然而，希腊化不是希腊文化的单向输出，而是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和融合。世界文化史的一般研究已经从社会层面说明了这一点，但我们还需要从精神层面加以说明。

亚历山大长期受到希腊古典文化的熏陶。他在进行军事征讨时也没有忘记把希腊文化传播到被占领的地区和民族中去。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步伐，希腊人的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在北非和西亚广大地区流传开来。同时，他也不忘用东方国家的材料来充实希腊文化的内涵，从而使希腊文化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在希腊化浪潮的影响下，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热衷于研习希腊哲学，并把它移植到犹太教的母体中去。托勒密六世（约公元前 186—前 145 年）时的犹太神学家阿里斯托布罗从哲学角度注释《摩西五经》，其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是，东方国家和民族有其自身悠久的传统，亚历山大梦想的文化融合因这些传统的抵触而未能实现。在各个希腊化国家，处于社会上层的是希腊文明熏陶的马其顿人，而社会下层却是亚洲和埃及各民族大众。古典时代希腊人对智慧的热爱，对传统的理性态度，一旦时过境迁，在希腊本土尚难持续发展，对东方民族，就很难谈得上改变他们的性格和征服他们的心灵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文化薰染而成的东方思维方式渐渐渗入西方。东方的宗教神秘主义渗透了希腊的哲学；巴比伦的占星术破坏了希腊的天文学；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取代了希腊式的民主制。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国家的统治者和罗马的历代帝王，差不多都按照东方皇帝和埃及法老的方式

把自己宣布为神,并建立了一套崇拜自己的宗教仪规。东方诸神和相应的崇拜仪式差不多都被希腊人接受过来。

总之,希腊化时期并没有因为希腊文化的扩展而被“提高到一个希腊的文化世界”^①,相反,希腊古典文化的主导倾向(科学与理性)在此过程中丧失了它的锐气,被宗教化了。希腊理性主义的东传和东方宗教神秘主义的西侵,最终导致在欧亚非广大范围内形成新一轮宗教信仰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以理性主义为主要标志的希腊古典哲学没有能够保持其原有地位,成为新文化综合体的主导层面。其主要原因是:有利于理性主义发展的城邦民主制的崩溃,东方民族文化中的宗教势力的强大,及宗教神秘主义对希腊哲学的渗透。而东方宗教的代表犹太教在希腊文化时期主动汲取了希腊哲学或理性神学,由此开始了犹太教一神论思想与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神学思想的结合。到了罗马帝国初期,我们看到犹太思想家斐洛将犹太教义与柏拉图哲学、斯多亚学说相结合,开辟了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相结合的道路。他的神学是一种将哲学包容于自身的宗教的神学。

生平与著述

斐洛(Philo)通常又被人们称为犹太人斐洛(Philo the Jew)或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这座城市位于埃及尼罗河畔,在希腊化时期是流散的犹太人的主要居住地之一。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页275。

关于斐洛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他出身于亚历山大一个富裕而又有影响力的家庭。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高级税务官。他的外甥于公元四十六年担任犹太地区的行政长官。公元三十九年或四十年,斐洛参加了一个由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派遣的使团,去向罗马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申诉他们遭受的迫害。晚些时候,斐洛在著作中记述那次使命的时候称自己为老人。据此,人们推测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二十年。他去世的年代也不确定,大约是公元后五十年。斐洛可以说是耶稣和保罗的同时代人,但没有任何材料表明斐洛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斐洛的著述主要围绕三方面的内容:一、历史著作;二、对旧约经典的诠释;三、神学著作。他有很多著作传世,大部分是希腊文的,也有少量著作仅存亚兰文本。现有英文译本有以下两种:

一、Philo, 12 vols, Translated by F. H. Colson etc.,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Reprint 1971. 这个集子的前十卷收录了斐洛的全部希腊文著作,并附英译文,后两卷增补了斐洛的那些仅有亚兰文本的著作。

二、The Works of Philo, Translated by C. D. Yonge,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Massachusetts, 1993. 这个英文集子最初以四卷本的形式于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出版(The Works of Philo Judaeus, the contemporary of Josephus,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London: Henry G. Bohn)。

为了便于进一步研究,兹将收入 Loeb 古典丛书中的斐洛著作篇名按缩略语、拉丁译名、英译名、汉译名的顺序列举如下:

Abr. De Abrahamo, On Abraham《论亚伯拉罕》

Aet. De Aeternitate Mundi, On the Eternity of the World《论世界的永恒性》

Agr. De Agricultura, On Husbandry《论耕作》

Cher. De Cherubim, On the Cherubim《论基路伯》

Conf. De Confusione Linguarum, On the Confusion of Tongues《论语言的混乱》

Cong. De Congressu Eruditionis Gratia, On the Preliminary Studies《论预备性的学习》

Decal. De Decalogo, On the Decalogue《论十诫为律法之首》

Det. Quod Deterius Potiori insidiari soleat, The Worse attacks the better《恶人攻击善人》

Ebr. De Ebrietate, On Drunkenness《论酗酒》

Flacc. In Flaccum, Against Flaccus《弗拉库的行迹》

Fug. De Fuga et Inventionem, On Flight and Finding《论逃避与发现》

Gig. De Gigantibus, On the Giants《论巨人》

Hyp. Hypothesica/Apologia pro Iudaeis, Apology for the Jews《为犹太人申辩》

Jos. De Josepho, On Joseph《论约瑟》

Leg. De Legatione ad Gaium, On the Embassy to Gaius《向盖乌斯请愿的使团》

Leg. All. Legum Allegoriarum,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喻意解经法》

Mig. De Migratione Abrahami, On the Migration of Abra-

ham《论亚伯拉罕的移居》

Mos. De Vita Mosis, Moses《摩西传》

Mut. De Mutatione Nominum, On the Change of Names《论更名》

Op. De Opificio Mundi, On the Creation《论创世》

Plant. De Plantatione, On Noah's Work as a Planter《论诺亚的农作》

Post. De Posteritate Caini, On the Posterity and Exile of Cain《论该隐的后生与放逐》

Praem. De Praemiis et Poenis, 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论赏罚》

Prov. De Providentia, On Providence《论天命》

Quaest. in Gn. Questiones et Solutiones in Genesin,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Genesis《创世记问答》

Quaest. in Ex. Questiones et Solutiones in Exodum,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Exodus《出埃及记问答》

Quis Her. Quis rerum divinarum Heres sit, Who is the Heir《谁是继承人》

Quod Deus. Quod Deus sit Immutabilis, On the Unchangeableness of God《论上帝的永恒性》

Quod Omn. Prob. Quod omnis Probus Liber sit, Every Good Man is Free《善者皆自由》

Sac. De Sacrificiis Abelis et Caini, On the Sacrifices of Abel and Cain《论亚伯与该隐的献祭》

Sob. De Sobrietate, On Sobriety《论清醒》

Som. De Somniis, On Dreams《论梦》

Spec. De Specialibus Legibus, On the Special Laws《论专门的律法》

Virt. De Virtutibus, On the Virtues《论美德》

Vit. Cont. De Vita Contemplativa, On the Contemplative Life《论沉思的生活》

沟通两希文化的桥梁

斐洛是希腊化时代与罗马帝国时代之交最有代表性的犹太思想家,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犹太民族对希腊精神文化的汲取。他熟悉并经常引用希腊人的经典作品,特别是荷马和欧里庇德斯,并用典雅的古典希腊语从事写作。他经常以崇敬的口吻提到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斯多亚学派。对斐洛影响最大的希腊哲学家是柏拉图。他提到过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尤其是《会饮篇》和《蒂迈欧篇》。斐洛在宗教思想史上的地位主要依靠他对希腊文化和犹太教的融合所做的工作。这种工作从宗教角度看,是把犹太教理性化、希腊化,从而为基督教的发展和教父学的诞生开辟了一个方向;从哲学角度看是把当时流行的一些希腊哲学观点神学化,把哲学导入神学。他是“调和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调和理性主义和启示运动的顶峰。为了这种目的,他挑选了希腊哲学中最伟大的柏拉图。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为后世的神学家们树立了典范。首先是普罗提诺,遵循斐洛调和柏拉图和希腊宗教;接着

是奥古斯丁,调和柏拉图和基督教。”^①

以往学者们在谈及斐洛思想与希腊哲学的关系时,往往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又因研究重点不同而强调了具体学派或哲学家对斐洛的不同影响。例如,策勒特别强调斯多亚学派对斐洛的影响,认为离开斯多亚学派,斐洛的体系是无法阐述清楚的。^② 我们认为,无论希腊思想对斐洛的影响有多大,也无论有多少希腊哲学家影响了斐洛,斐洛从来没有因此而丧失自己的神学基本立场。希腊哲学是他的工具和思想资料。他在用希腊哲学注释犹太圣书,用柏拉图注解摩西。“在摩西身上他找到了柏拉图”^③。早期拉丁教父杰罗姆已经说过,或者是柏拉图斐洛化了,或者是斐洛柏拉图化了。这里前半句讲的是斐洛对柏拉图思想的利用,后半句讲的是柏拉图思想对斐洛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属于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

肯定斐洛对希腊文化和希腊哲学的汲取经常带来一种误解,以为斐洛只是一个东拼西抄的折衷主义者,他的思想只是随意从各个学派那里取来的大杂烩。这种误解只要我们了解到斐洛在汲取希腊文化时的基本立场就可以打消。实际上,斐洛在汲取各种希腊哲学观点时并没有放弃他的犹太教立场和希伯来文化的本位。他认为,摩西是哲学的主要源泉,而那些希腊哲学流派的“小

① J. K. Feibleman, *Religious Platonism: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Plato and the Influence of Plato on religion*《宗教柏拉图主义:宗教对柏拉图的影响和柏拉图对宗教的影响》, London, 1959, 页 102。

② E. Zeller, *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希腊哲学发展史》, 卷三, 下册, Leipzig, 1881, 页 402。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卷三, 同前, 页 162。

体系”只不过是摩西那里来的折光。《旧约》是最有智慧的一本书，是真正的神的启示，摩西才是最伟大的导师。《圣经》的每个词，特别是那些他归于“全智的”摩西的话，在他看来都是在圣灵激励下产生的，由神指点的七十士译本是这样，希伯来原文也是这样。但同时他又深深地意识到，这些神圣的话语如果只按字面意义去理解有时就会变得不可信，不是偶然的琐碎，或任何意义上的不妥，而是其中必有某些蕴涵的思想，在神恩的帮助下，通过耐心的沉思一定能提取出来。他对《圣经》的解释虽然包裹在希腊哲学术语之中，但他的根本目的只是利用希腊哲学，而不是从整体上或是在信仰的层面上接受希腊哲学。在他看来，在任何情况下，上帝直接或间接地都是摩西律法和希腊哲学真理的源泉；因为人的心灵和上帝是血缘相通的，人是上帝按逻各斯或理性的形相创造出来的，因此，人有某种接受和发现超时空实在的能力；集中到这个超越的世界的中心之点上，宗教和最好的希腊哲学是同一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斐洛凭借喻意解经法，用希腊哲学的理论来解释《旧约》。

对《圣经·旧约》，特别是对“摩西五经”中的《创世记》的喻意解释构成了他的著作的主要部分。他认为摩西使用了神话的、历史叙述的、祭仪律法的外在形式，表述一种内在的精神的意义。现在他要做的是，强调它们同最好的希腊神学、科学和伦理学是完全一致的。喻意解经法是斐洛用来沟通神学和哲学、犹太教和希腊哲学、信仰启示和理性的方法。其结果就是在犹太教和希腊哲学这两大思想体系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并产生了一种神启宗教和哲学的综合体。斐洛对《圣经》的喻意解释，不仅开创了犹太教、基

督教专事研究和诠释《圣经》的学科“解经学”的漫长历史,而且为后来西方世界用哲学服务于宗教神学的传统奠定了基础。“在怎样将希腊化思想与希伯来思想结合方面,他作出了伟大的示范。在后来的基督教神学中,二者果然结合在一起了。在罗马世界的其它地方,斐洛所代表的这种结合过程都比不上在亚历山大发展得更加充分。”^①

斐洛思想的现代意义

斐洛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在一个东西方思想融合的时代(希腊化时代)终结之时,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东西方融合的时代(罗马帝国时代)来临之际,斐洛超过其它任何思想家,给我们展示了这种思想融合的历程。他既是犹太教与希腊文化的联系者,又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联系者。正是通过这种历程,来自希腊和来自巴勒斯坦的两股精神力量融汇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新质的早期基督教神学。

斐洛与早期基督教的代表人物没有直接的来往。因此,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和有意识的借用。但是,由于具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共同的理想,斐洛的思想在基督教中拥有了力量。他的理性化了的一神观念和由他集大成的喻意解经法使他的思想成为“天然的基督教的生命”。由斐洛集大成的喻意解经法在早期基督

^① W. Walker,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基督教会史》, 3rd edition, New York, 1970, 中译本, 孙善玲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页 19。

教神学的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以后又一直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早期神学家的著作中广泛运用。《新约》的作者们也显示出受到这种方法的影响,《希伯来书》就是这样,明显地追随斐洛。使徒保罗熟悉这种方法,在《哥林多前书》中,把灵磐喻意解释为意指上帝。希腊教父查士丁的身上可以看到斐洛的影子。在两位伟大的自由派的基督教父,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和俄里根那里这种影响更加明显。俄里根不仅否认了旧约《创世记》字面上的正确性,而且认为《新约》上记载的恶魔携耶稣登山示训是属喻意性质的。推而广之,俄里根在他的重要著作《论原理》中,就力图用希腊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来解释《圣经》。在拉丁教父中,安布罗斯相当多地引用过斐洛。

基督教神学的早期历史形态主要是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境况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神学的丰硕成果无疑借助了希腊罗马文化的深厚思想资源。斐洛的思想与方法在建设希腊神学和拉丁神学中的作用表明,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基督神学的创建和发展离不开对既有思想资源的解构。当今汉语神学的建设无论是以“本体论的样式”还是“生存性的样式”进行^①,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使之能成为有利于基督信仰生长的土壤。

^① 参刘小枫,《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见《道风:汉语神学学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2),页45。

目 录

英译本序言	1
英译本绪论	3
论摩西有关创世的叙述	15
《创世记》第二、三章的意喻解释	71
第一卷	73
第二卷	107
第三卷	137

英译本序言

已经阅读或将要阅读斐洛全部著作的人可能很少,但有很多人会偶然涉猎它们,这两类读者中总会有许多人欢迎有一个译本。如果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就很难否认出版一个新的译本已经是时候了。C. D. Yonge 的译本(1854 年出版)据我们所知是唯一的英文译本,已经不再付印,传下来的也很稀少。Yonge 的译作是相当重要的一项贡献,但有许多地方需要订正。他使用的是他那个时候不太可靠的希腊原文,而非今日通用的文本。再说,他按希腊原文的句式严格地再造斐洛冗长而又复杂的句子,这样做在我们看来使得这些论文变得没有必要的单调和笨拙。我们采取了与不同的方法,希望这样做不会损害对原文的忠实。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可不提由多人合作的德文译本,这个译本当 Cohn 在世时一直由他负责编辑,而且仍在修改中。我们发现这个译本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用的,但我们从中得益的主要是他们提供的关于柏拉图和晚期希腊哲学家的注释和参阅材料,尽管翻译不是评注,斐洛的读者们如果没有发现这位作家在不断地引用或采用柏拉图和斯多亚学派作家的话,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些注释。我们对这些引语和引用的解释远非完整,但若无德文译者的帮助就会更不完整。

Cohn 和 Wendland 的重要译本(1896—1914 年出版)已经胜过 Mangey 的版本,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处理原文方面的困难。总的说来,我们两人都采用了这个版本的理解,甚至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亦如此。在这种犹豫不决已经堆积为深信的地方,我们偶尔借助于编辑提供的非常完整的书中附供比较的材料,采用了他们放弃了的那种读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译本比他们的更接近原始文本。我们也引进了少量我们自己的校订,全部放在脚注中。

应当说明,我们的译本不是完全字义上的合作的产物。我们各自仔细地阅读和批评了对方的翻译和工作,许多批评都被对方接受用于校正和完善译文。但总的来说,我们对各自的工作,原文方面的问题和翻译,仍负有全部责任,若有错误不能归咎于对方。第一卷的所有译文是由 Whitaker 先生译出及 Colson 的贡献,除了刚才已经提到过的批评和建议以外,有总绪言、参照表的一部分,以及相当一部分附录中的注释。第二卷的三篇论文,即 *De Cherubim*、*De Sacrificiis* 及 *De Gigantibus* 由 Colson 先生翻译,其它两篇论文则由 Whitaker 先生翻译。